

分类号
UDC

密级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研究生姓名: 郭心怡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张存刚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提交日期: 2023年5月30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郭心怡 签字日期： 2023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 张树刚 签字日期： 2023年5月30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郭心怡 签字日期： 2023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 张树刚 签字日期： 2023年5月30日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ndidate : Guo Xinyi

Supervisor: Zhang Cungang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有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山西省作为典型资源大省,以往的工业发展战略使其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时更多地向工业、城市倾斜,导致城乡发展失衡较严重。近年来,山西省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并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努力,取得一定成效,但城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立足山西省实际,深入探究城乡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对策建议,对于促进山西实现乡村振兴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内涵进行概述,接着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别对城乡关系理论进行回顾与分析,便于更深入地理解城乡融合,为全文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随后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困境进行考察与分析,为后续评价指标的选择和对策研究提供参考。结合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内涵特征,遵循指标设计原则,从城乡经济、要素、社会、生态融合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省及11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1年到2020年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城乡关系得到改善,但还存在经济融合动力不足、要素融合通道不畅通、社会融合体系不健全、生态融合程度不足的问题,并且11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差异较明显。最后,针对前文发现的问题,提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即加快构建城乡现代化产业体系;畅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渠道;打造宜居宜业城乡环境,以期山西省及我国相似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山西省 城乡融合 水平测度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mally propose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mphasiz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policy syste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effectively breaking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s a typical province with rich resources, Shanxi's previou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made it more inclined to industry and cities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ulting in a serious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Shanxi Province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has made many explorations and effort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has achieved some resul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uts forward constru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hanxi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n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ull paper. Subsequently, the practic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Combining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indicator design,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urban-rural economy, factor, society and ecology integration to measur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Shanxi Province and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1 to 2020,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has shown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improv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mpetus for economy integration, blocked channels for factor integration, imperfect system for society integration, and insufficient ecology integration.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s not balanced, which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found abov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Shanxi Provinc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mooth two-way free flow channels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create livable and appropriate business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Shanxi Province and similar regions in China.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hanxi Provi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measurement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国外研究.....	3
1.2.2 国内研究.....	5
1.2.3 文献评述.....	9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9
1.3.1 研究方法.....	9
1.3.2 主要内容.....	10
1.4 创新与不足.....	10
1.4.1 创新点.....	11
1.4.2 不足之处.....	11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12
2.1 相关概念.....	12
2.1.1 城乡关系.....	12
2.1.2 乡村振兴.....	13
2.1.3 城乡融合.....	14
2.1.4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逻辑关系.....	14
2.2 理论基础.....	15
2.2.1 西方经济学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	15
2.2.2 政治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	17
3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和问题	27
3.1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27
3.1.1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27

3.1.2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8
3.1.3 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9
3.1.4 乡村建设持续推进	30
3.2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问题	30
3.2.1 城镇体系的集聚辐射带动力不足	30
3.2.2 农村劳动力、人才短缺问题凸显	32
3.2.3 城乡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34
4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36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6
4.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36
4.1.2 评价指标选取及说明	36
4.1.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成型	38
4.2 评价方法及权重确定	39
4.2.1 数据来源	39
4.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42
4.2.3 指标体系的赋权	42
4.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43
4.3.1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43
4.3.2 各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44
5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45
5.1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	45
5.1.1 经济融合	46
5.1.2 要素融合	47
5.1.3 社会融合	47
5.1.4 生态融合	48
5.2 各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	48
5.2.1 晋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49
5.2.2 晋中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50
5.2.3 晋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50

5.2.4 晋东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51
6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53
6.1 加快构建城乡现代化产业体系	53
6.2 畅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渠道	54
6.3 打造宜居宜业城乡环境	55
6.3.1 进一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55
6.3.2 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6
6.3.3 持续改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	56
参考文献	58
后记	63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社会得到飞速发展。然而在我国城市已经得到快速、充分发展的同时，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及存在多种制约因素，广大农村地区却发展缓慢、经济滞后，如农业生产基础仍不稳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落后、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等。城乡差距的加大，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我国做出了许多努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列为“五个统筹”发展理念的首位，其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新判断，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新要求，即“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对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2017年，党的十九大做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重要论断，并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着重强调重塑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总要求，与2005年关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相比，更加注重城乡发展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体现了我国城乡关系发展思路从“城乡二元”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一体”、最终到“城乡融合”的根本转变。乡村振兴不再仅限于从乡村本身思考其发展问题，而是把乡村与城市的发

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达到城乡均衡、共同发展的目的,城乡能否融合发展决定乡村振兴的成败。2022年党的二十大再次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未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指明了实现路径。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山西省作为我国典型的资源大省,城乡融合发展不仅面临全国的共性问题,而且存在着许多复杂的个性问题。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山西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时更多地向工业和城市倾斜,造成工业无力反哺农业、城乡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消极结果。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之后,山西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并深刻认识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2018年《山西省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2018-2022年)》提出按照城乡融合的理念,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之后在《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城乡融合发展形态基本形成”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提出要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增强。目前,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城乡关系得到改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前进,但城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城乡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生产要素分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等仍存在明显差距,相比其他省份城乡融合发展的任务更加必要且紧迫。因此,本文立足山西省实际,深入探究城乡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对策建议,为走出一条具有山西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提供参考,对山西实现经济转型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城乡关系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们从各自学科角度进行探索和分析,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新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城乡关系,不仅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研究补充相关的内容,而且对山西以及其他省份或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结合乡村振兴背景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文献较少,本文通过对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内涵进行总结概述,分析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丰富和完善了城乡发展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梳理总结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实践经验,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更针对性地研究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短板和不足,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结合山西实际,设计较为科学和全面的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西及其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

1.1.2.2 现实意义

山西省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但目前学术上山西省城乡发展的相关文献不多,实证分析研究也较少。本文将基于此背景,立足山西城乡发展现状,对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找到短板并针对不足提出建设性对策,为新形势下山西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思路,对其实现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可以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加细化的参考方案,从而缓解城乡发展矛盾、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因此本文对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针对当前城乡关系的具体实际提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目前,国外学者对城乡融合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进行了研究,大多数文献集中探讨的是城乡关系,并且研究的时间起源相对较早。

1.2.1.1 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

早在 16 世纪左右,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出了城

乡结合发展的理念。托马斯·莫尔（2006）在其所著的《乌托邦》中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岛国，岛国里不存在私有制，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公共所有，人民共同劳动，按需分配，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乌托邦没有贫富差距，也就不存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此外，沙利·傅立叶提出的“和谐制度”、罗伯特·欧文设计的公社制度等都预言未来理想社会中城市与乡村不应相互孤立，而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共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其他学者的城乡关系思想上，结合所处时代背景，提出了城乡融合思想。马克思非常重视城乡关系问题，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环节。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使城乡关系转向了分离和对立。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具有理论前瞻性地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最早提出“城乡的融合”这一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也多次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思考，共同构成了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

1.2.1.2 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研究成果丰硕，如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刘易斯·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论、伊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麦基的“Desakota”理论和岸根卓郎的“城乡融合设计”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城市和乡村实现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和方法。霍华德（1946）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倡议建设一种集城市与乡村优点于一身的城-乡结合体，即田园城市。之后，该书再版并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霍华德在其中提倡了一种社会改革思想，即将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转化为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芒福德（1989）十分赞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同样强调城乡的平衡协调发展，主张形成一种“区域城乡统一体”的空间格局，来预防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沙里宁（2014）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系统地阐述了有机疏散理论。为解决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该理论主张把以前密集的城区分成一个一个的集镇，彼此用绿化地带分开、用高速交通联系，成为一个既统一又分散的有机整体，也是一种城乡区域

均质体。加拿大学者麦基（1986）在研究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时，发现了一种分布在城市边缘的农业及非农业活动并存、兼具农村和城市特点的地域组织结构，并将其称作为“De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一种研究城乡关系的新思路。岸根卓郎（1990）认为 21 世纪的国土规划目标应该体现出一种集约城市和乡村优点的新型设计思想，强调建立一个“自然-空间-人类系统”三位一体的“城乡融合社会”。

1.2.1.3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研究

进入 21 世纪，国外学者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分别从发展城乡财产（S.Lunkevicus 等，2001）、要素城乡互动（Kawate Tokuya, 2005; P.Veneri 等，2013）、新公司的形成与人口结构变动（Delfmann H 等，2014）、粮食可持续发展能力（Aurora C 等，2014）、农业与现代化的关系（Bjørkhaug H 等，2018）等不同方面分析了城乡发展问题。在城乡差距影响因素方面，Datt 等（2002）认为产业结构变动会加剧城乡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Sophie（2018）强调在考虑资本收入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Mishra 等（2019）通过对亚洲九个国家特定时期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另外，Richard E. Wood（2008）、Akihisa Nonaka 和 Hiroshi Ono（2015）等学者还对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2.2 国内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逻辑关系、城乡融合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部分重点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1.2.2.1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关研究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国内学者认为乡村振兴不再只是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意味着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王佳宁，2017），是新

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李周，2018），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振兴（魏后凯，2018）。张建伟，图登克珠（2020）通过构建“五维一体”的分析框架，总结了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逻辑关系，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和目标。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化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刘合光，2018），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农村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全面繁荣发展（关浩杰，2018），对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国际地位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万信等，2018）。同时，丁忠兵（2018）强调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即勾勒了农村发展更美好的蓝图，明确了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创新了农村产业发展的思路，构建了新型城乡互动关系，巩固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根基。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入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从理论内涵方面：廖彩荣，陈美球（2017）就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和科学内涵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强化制度供给、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抓住核心关键要素等才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李长学（2018）首先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并阐述了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接着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成因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思想认识、依靠力量、五位一体和制度供给等方面制定了推行路径。从面对的矛盾方面：马义华，曾洪萍（2018）归纳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当处理好的四个重要关系，即乡村-城镇、农民-土地、家庭-集体、政府-市场，将完善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深化改革农村土地、经营和集体产权制度、加强乡村公共产品优先供给等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突破方向。马义琳，潘明辉（2021）系统分析了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以及乡村振兴面临的约束条件，在精准把握“共性-特色”、“城市-乡村”、“内部-外部”、“远期-近期”四对关系的基础上，从产业发展、培育主体、建优载体、激活要素四个方面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建议。另外，闫坤，鲍曙光（2019）从财政支持的视角探讨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构建相关财力保障机制；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强化制度性供给；通过财政引导构建多元共治乡村治理

格局。

1.2.2.2 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关研究

在城乡融合的内涵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城市偏向的以城带乡发展，也不是均衡的城乡无差别发展（杨志恒，2019），而是保留城市和乡村各自特色，通过城乡资源要素自由对流、产业联系紧密、功能互补互促（许彩玲等，2019），实现城市和乡村在要素、经济、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融合（欧万彬，2020），从而推动城乡之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向一体化方向和谐发展（涂圣伟，2020）。并且，李爱民（2019）还强调由于我国城乡融合区域性差异明显，不同区域间城乡融合状况略有差异，所以城乡融合的重点也有所不同。邢澍，王国勇（2019）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认为城乡融合发展包括产业支撑、人口转移、民生建设等内容，其中产业支撑是基础，合理转移贫困地区人口是关键，民生优先是根本。

在城乡融合测度评价方面。周佳宁等（2019）以“五位一体”新型城镇化等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导向，构建了“人、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五个维度的城乡融合评价体系。赵德起，陈娜（2019）从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动力、结果3个维度选取指标来构建，并使用横纵向拉开档次法对全国以及30个省市2007-2016年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得到了各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状况以及变化趋势，并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赵华等（2019）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和要求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从多个角度对全国省级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除此之外，具体到我国各地区城乡融合水平的测度，贾小宇，陕永杰（2020）从城乡发展与城乡联系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空间分析对2017年山西省119个县级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发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区域地形、人均GDP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认为可通过交通突破地形的障碍，从而提升区域整体实力以及实现区域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叶超等（2021）基于经济、人口、社会三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从不同尺度对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进行了评估。

在城乡融合路径探索方面。整体而言，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工作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

制(姜长云, 2018)。二是发展, 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 通过增强政府可支配财力, 进而在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乡一体化上多投入(姚毓春等, 2021), 同时, 城乡融合发展要考虑地方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宋迎昌, 2019)。黄渊基等(2019)指出城乡在生产经营、要素资源、资产收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管理服务方面的融合是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六个着力点。陈潭(2021)认为应用数字技术可以更加高效地开采和利用乡村社会资源赋存, 推动城乡失衡关系的修正, 因此, 包容性的数字城乡融合机制建设已经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 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比如: 苏南模式(康永超, 2013)、浙江模式(范今朝, 2013)、上海模式(吴元波, 2013)以及北京模式(许德才等, 2013)等。

1.2.2.3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在目标、本质和空间上具有一致性(张明斗等, 2019), 二者相辅相成, 互为支撑, 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用。何仁伟(2018)通过探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和相互关系, 建立城乡空间均衡模型以及城乡等值线, 从而为我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指出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刘彦随(2018)从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出发, 立足当前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难题, 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科学途径。关于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内涵和特征, 赵早(2020)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城乡空间的有机融合, 城乡的共同发展, 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 一二三产业交叉渗透、融合发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提高。同时, 一些学者探索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陈丹, 张越(2019)通过分析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与难点, 从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建立要素双向配置互动机制、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唐琼(2020)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认为只有实现产业、空间和要素融合, 才能稳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测度评价方面, 杨飞虎等(2020)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从城乡要素融合、宜居融合、治理融合、产业融合和富裕融合五个维度设计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和均值标准化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进行测度, 并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探究地区差异, 为我国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提供参考。殷锐 (2021) 构建了包含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和城乡空间融合三个维度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对广东省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分析。

1.2.3 文献评述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 可以发现国外城乡关系研究大多从微观视角进行, 探讨了城乡发展的内涵、本质及影响因素, 但主要是理论研究, 缺乏对具体案例的探索, 定量研究不足。国内学者对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及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对于我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的实践有指导作用。但仍有不足之处, 以往关于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研究大多在较发达的地区或从国家的角度进行, 而对类似山西这种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研究较少。目前针对山西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城乡一体化方面, 而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并不全面和系统。因此,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结合乡村振兴大背景对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分析, 找到改进的方向和对策, 也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提供解决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思路。

1.3 研究方法 with 内容

1.3.1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利用知网、学校图书馆等相关数据库, 对有关城乡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纳总结。同时, 认真学习关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资料, 为本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本文在文献资料梳理的基础上, 对城乡融合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结合山西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情况, 运用熵权法及线性加权法, 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找出山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短板, 从而提出山西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3) 比较分析法。一方面, 以时间为参考, 对山西省 2011 年到 2020 年的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以空间为维度，分析 2020 年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情况，找出不足之处，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3.2 主要内容

本文总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文章写作的背景、研究意义，总结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首先对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内涵进行概述，并分析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逻辑关系，方便进行后续研究；其次对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关城乡关系的理论进行整理概述，着重分析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章：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困境。首先从城镇化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及乡村建设四方面分析山西城乡发展现状，阐明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其次从城镇体系、农村劳动力、城乡环境三方面研究山西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第四章：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首先基于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内涵，依据指标构建原则，从城乡经济融合、要素融合、社会融合及生态融合四个维度设计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为指标体系赋权；最后用线性加权法对 2011 到 2020 年山西省及 2020 年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得出结果。

第五章：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根据第四章的测度结果，首先对山西省整体进行评价，分析其 2011 年到 2020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情况；接着根据各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分，分区域进行分析并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六章：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对策建议。根据第三章的分析与第四、五章的测度评价，系统性地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山西及我国相似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点

1.研究视角较为新颖。进入新时代后，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方面或是单纯研究城乡融合，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结合讨论的文献还相对较少，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研究，在研究视角上较为新颖。

2.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已有研究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多是基于新发展理念或从其他维度构建，本文基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内涵和要求，结合地方发展特点，构建山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3.研究对象的选取较为新颖。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将视角集中于全国各省份的比较及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较为宏观，而对单一省份的研究较少，关于山西城乡融合的研究成果也略显不足。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不仅分析近十年来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化情况，而且对 11 个地级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使研究更加的直观和具体，因此，在研究对象上较为新颖。

1.4.2 不足之处

1.城乡融合理论分析不够具体。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非常丰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梳理总结较少且不系统，因此本文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和主张时进行了精炼概括，使得城乡融合理论分析不够具体。

2.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无法做到全面。由于城乡融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涉及到的变量很多，而目前学术界对于城乡融合的测度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本文在构建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时可能存在遗漏指标的情况，使得结果分析不够精确。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并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为此需要首先界定城乡关系(包括城市与乡村)、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关键概念,以方便进行后续研究。

2.1.1 城乡关系

正确把握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与特征是认识城乡发展走向的前提,也是制定城乡发展政策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指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的人口聚居地,其基本特点是人口密度较低且呈散落居住,主要经济基础为农业生产,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在我国,乡村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普遍较为落后,这导致大多数人对乡村的认识具有种种歧义。为消除对乡村的刻板印象和建设中的偏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乡村”一词赋予明确定义,即“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在其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关注时代特色,发掘多重功能。可以说新时代乡村正在发生着根本性改变,逐渐成为承载人类活动、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区域。一般而言,城市是指以非农生产和非农人口为主的人口聚居地,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较稠密、产业结构以二三产业为主、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经济较为发达。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内涵和功能不断丰富,成为一个区域经济、文化、政治等的中心和社会资源的集中地,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正如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①。”

虽然城市和乡村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二者并非相互隔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这种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互动关系就是城乡关系,它也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城乡关系包含广泛的内容,如城市与乡村区位关系、工业与农业关系、市民与农民关系等。城乡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我国二元社会经济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4.

结构突出，必须科学理解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1.2 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这一概念，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主要目的是为促进传统乡村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解决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的农村短板。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而且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机结合。

具体而言，乡村振兴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的。其中，产业兴旺是前提条件。乡村产业兴旺，不仅能够提供更丰富的高品质农产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可靠持久的保证，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实力，还为农村吸引和凝聚更强大的人才队伍，持续提升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生态宜居是内在要求，是广大农民群众对美丽家园和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只有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创造更多金山银山。而以往的农村过度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对农田耕地和江河湖泊造成了极大破坏和污染，导致生态严重失衡，阻碍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振兴致力于改变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生态导向、绿色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乡风文明是推动力量。乡村振兴的主阵地在农村，农民群众既是主体参与者、建设者，也是受益者。乡村不是“野蛮”“文盲”的代名词，要形成文明乡风，才能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美好社会的有力保证。新时代的农村发展已经不是仅仅为了摆脱贫困，而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发展权利，保障和满足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有效的乡村治理能够使农民群众的责任意识增强，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行动，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确保乡村充满活力、和谐安定。生活富裕是根本目的，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效果如何关键要通过农民的富裕程度来检验。当前阶段

我国的城乡差距还较大，只有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让其与城市居民平等享有现代文明发展成果，才能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总而言之，乡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三农”问题是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性议题，乡村是否振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必须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2.1.3 城乡融合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内容。尽管“城乡融合”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等概念一脉相承，但根据其提出的时代特征和阶段要求，城乡融合具有自身独有的内涵。融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物质或事物结合成为一体的过程，城乡融合体现的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融合关系，具体指对城乡进行统一规划布局，打破原有使二者相互分割的壁垒，使各领域生产要素相互流动、优化组合、合理分配，促进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相互融合，最终消除发展差距，实现协调统一发展。

城乡融合有三个层面的特征：一是承认城乡差异。城乡融合绝不是城乡一样化，也不是就城市谈城市、就乡村谈乡村，而是根据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城乡进行统筹谋划，使二者在保持差异性和辨识度的基础上，遵循各自发展规律，相互配合、分工合作，逐步消除非功能差异，促进城乡发展内容互补及发展水平均衡。二是城乡地位平等。城乡融合的本质是要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权平等，这意味着要调整以往不平等不协调的城乡关系，打破城乡互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及信息交流，形成公平正义的城乡发展观。城市和乡村不仅共同参与城乡建设，而且共同享有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成果。新时代要更加注重把人的多层次需求与发展的多样化成果进行有效衔接，增强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三是城乡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渐进的过程。我国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到单向流动，再到转为双向互动交流阶段，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城乡融合涉及内容多、范围广、辐射面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方能实现。

2.1.4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逻辑关系

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突破口。城乡融合涵盖了经济、社会、

生态以及人等各方面的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和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各项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加快流动互通,并且通过城市向外的辐射带动作用,将乡村振兴所需的人、财、物等资源引导至农村,实现要素供应的可持续性,从而为乡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城乡融合发展会打破城乡壁垒,密切城乡之间的联系,不仅刺激城市居民对乡村产品的需求,带动乡村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升级,提高乡村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途径,通过乡村振兴可以促进城乡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我国发展短板仍在乡村,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补齐这一关键短板,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乡村的发展和振兴,就不是完整的、真正的城乡融合发展,只有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多措并举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加快发展,才能逐渐缩小与城市的差距,消除两者之间的不平衡,从而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因此,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这就要求社会发展要关注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不能为实现一方的快速发展而导致另一方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国家富强包括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振兴,当前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新形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2 理论基础

成功的实践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通过对国内外与城乡融合有关的理论进行回顾与梳理,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城乡关系理论进行具体分析与阐述,有利于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城乡融合,为后续研究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做好理论准备。

2.2.1 西方经济学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进程中,存在两个性质不同的生产部门,一种是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工业部门,一种是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农业

部门，二者同时发展但又有一定的动态差异性，在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入水平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由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二元结构进行分析研究，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2.2.1.1 “城市偏向”的发展理论

“城市偏向”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约翰·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认为新工业部门比传统农业部门在扩大再生产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可行性，当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时会形成剩余产出，若工业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该部门资本存量及对劳动的需求会因此而提高。只要传统农业部门还存在过剩劳动力，这一过程就会持续进行，直到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被全部转移。此时工资水平线和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直线变成斜率为正的曲线，工业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都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逐步提高，工农业将趋于均衡发展，从而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国民经济结构发生转变，最终二元经济结构消失，一元经济结构取而代之。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中提出“中心-外围”理论，他将个别由于人口密集、资本集中、经济增长速度快而率先发展起来的区域称为“中心”，其他发展缓慢或落后的区域则称为“外围”，二者在发展中处于不对等的关系，核心区处于主导和统治地位，是经济权利、生产要素、技术创新的集聚区，而边缘区则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区并受其控制。这种关系也存在于城乡之间，城市和农村关系就是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城市处于支配地位并拥有发展的优势，能够吸进农村的要素资源，而农村则处于从属地位，发展条件趋于恶化。“城市偏向”发展理论的学者都认为城乡发展应实行城市偏向战略，面对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关系，他们主张“工业主导性”；对待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他们认为要以城市为中心配置各种资源要素，而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作用，坚持“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理念。

2.2.1.2 “农村（农业）偏向”的发展理论

“农村（农业）偏向”的发展理论包括西奥多·W·舒尔茨的传统农业改造理论和戴尔·乔根森模型。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不能一味追求工业化而应重视传统农业的改造，并重点分析传统农业的特征，指出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必须通过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舒尔茨敢于向传统轻视农业的理论挑战，强调了农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且要改造传统农业，使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尤为重要。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在《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中提出乔根森模型，他在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基础上，对二元经济问题进行重新解释。乔根森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只有在其大于零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转移，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以及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农业生产剩余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相比于刘易斯，乔根森更加关注剩余劳动力的来源，也就是农业生产的作用，所以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创新。“农村（农业）偏向”发展理论的学者意识到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时，仍然忽视了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在发展中的协调性，与城乡融合思想不同。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象比较突出，如城乡空间布局不合理、生活水平及生产方式差距大、产业发展不协调等，已经成为阻碍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严重影响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推进，所以必须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2.2.2 政治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城乡关系时并没有将城市和乡村看作两种不平等的个体，而是认识到了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历届主要领导人都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城乡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乡关系理论和思想。

2.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大量精力研究“城乡融合”问题，在很多著作中都有阐述，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分离的现实情况，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出城乡融合是未来社会城乡关系的必然发展趋势，并深刻分析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同时对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设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物质匮乏和生产工具简单，人们生产能力低下，仅能满足自身需求，几乎不存在生产剩余，此时城乡关系分离状态尚未开始，城乡无明显差别，人们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基本相同。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人们劳动生产率得到增长，社会生产力逐渐提高，产生生产剩余，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出现，城乡关系开始走向分离。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①。社会分工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率较高的工商业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发生分离，而分别以这两大产业为主要集聚地的城市与乡村也呈现出一种分离的态势，城乡关系发生改变，所以马克思将工商业与农业形成的产业分工看作城乡分离的前奏。在工业革命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聚集在城市地区的工业部门通过改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农村地区的农业仍保持低效率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业与农业形成更加严重的分化，造成城乡由分离走向对立，农村逐渐沦为城市的附庸，城乡关系体现出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对立使无产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也造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人的畸形发展等严重后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与城乡对立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但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他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具有前瞻性地指出城乡融合才是城乡关系演化的历史归宿。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先提出“城乡的融合”这一概念：“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②。只有实现城乡融合，才能使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深刻分析了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4.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8-309.

力，这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生产力大幅提升，为消灭落后的传统城乡分工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化解城乡矛盾，从而为大多数人提供更优质的社会福利。其次，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发现由于在私有制下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城乡居民发展差距并没有随生产力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增大，因此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由大多数人掌握，才能消除城乡差别与对立，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最后，强调工业与农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加强农业的基础性作用和城市的带动作用，使工业和农业形成互补并不断发展，同时淡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边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城乡融合的进程。

2.2.2.2 列宁的城乡关系理论

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与俄国客观实际相结合，深入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城乡关系与城乡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城乡关系理论。

列宁认为俄国城乡对立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城乡关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并且这一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愈发严重。他根据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的具体国情与实践，将城乡对立产生的根源归为三点。第一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之前城乡分离也许不明显，但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深化发展，城市地区的工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农村地区的农业仍保留落后的生产方式，最终导致俄国工农、城乡的分离和对抗。第二是农业自身的生产特点。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特征，其生产受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的制约明显，并且劳动主体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使得农业比其他产业面临更大的风险。而工业生产相对稳定且收益较高，由此形成明显的工农差距，以工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自然比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发展快，城市与农村逐渐走向对立。第三是俄国农奴制封建残余的影响。1861 年俄国实行农奴制改革，但沙皇制度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革，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分配不平等、赋税沉重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缺乏动力，农村发展滞后。并且当时政策偏向于工业和城市，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和城市规模，造成城乡之间的差别与

对立逐渐加剧的不良局面。列宁认为城乡对立对俄国的经济、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由于城市与农村呈现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导致农村资源不足、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必然影响俄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会造成工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影响政治稳定。

为了缓解城乡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列宁根据俄国的客观实际，提出一系列解决城乡矛盾、消除城乡对立的措施。首先，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俄国农村被城市剥削压迫的现象无法改变，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对立的局面。第二，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可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而生产力能否快速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所以提升科学技术水平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消灭城乡对立提供经济基础。第三，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列宁认为建立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也是消灭城乡对立的根本保证。第四，实施新经济政策来维护农民利益。比如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农民生产合作社，改造小农经济；发展农村文化，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完善农村政权建设等。这一系列具体的惠农政策都是致力于消灭城乡对立的重要举措，具有借鉴意义。

2.2.2.3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统筹城乡建设的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因此处理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处理好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时代背景，对城乡关系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a. 城乡兼顾思想

毛泽东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我国客观实际相结合，提出城乡兼顾、互助发展的思想。

在建国前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革命战争胜利后我国所面临的新形势，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要论断，并指出工作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抛弃农村，主张“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

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①。毛泽东认为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犹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忽视任何一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完成，城乡之间应该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必须兼顾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的利益。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毛泽东强调要处理好“四面八方”^②的关系，通过“城乡互助”正确处理城乡关系。针对工农关系，毛泽东提出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根据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深刻教训和我国“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后农轻重比例逐渐失衡的实际问题所作出的科学判断。他认识到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制定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在确立以工业为主导地位的同时，始终牢记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一系列保障“三农”利益的措施，比如建立农业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推广农业技术，提倡农业机械化；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等，促进工农协调发展。毛泽东关于城乡兼顾、互助发展的思想是基于我国国情产生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探索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b.城乡互动思想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城乡差距逐渐显现，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指导下，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在城乡建设探索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城乡互动发展的主张。

首先，邓小平更加重视农业，将农业视为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同时加强工农互动，促进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一方面，基于我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强调农业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灵活性，并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产品产量和种植规模，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现状。另一方面，在我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后，通过工业支援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其为工业提供更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实现农业支援工业的作用。其次，以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加强城乡互动发展。邓小平认为改革要从农村开始，通过农村改革，不仅促进农村发展，而且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他积极进行农村经济体制

^①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54.

^② 四面指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指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

改革,在看到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成功做法后,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他还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主张改革统购统销制度,促进了农产品的自由流通,满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要求。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力量,被邓小平赞誉为“异军突起”。他认为新型的乡镇企业可以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活跃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时,乡镇企业是城乡互动的重要载体,它使城乡互联互通,使得城乡关系开始趋于协调。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城市改革也愈发必要。邓小平认为工业城市的发展壮大辐射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形成城乡互动的良好局面,因此指出“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①。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迈向新的历史阶段。

c.城乡协调思想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促进了我国经济水平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差距也越来越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江泽民深入分析城乡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和前两代领导人治理城乡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乡协调发展思想。

首先,江泽民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他认为“农业的安全、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生活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问题”^②。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价值规律决定了生产要素从低效农业部门流向高效非农业部门,造成城乡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但为维护社会稳定,必须使城乡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因此江泽民主张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解决好农民、农村问题。其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经济方面,江泽民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现行农村经济体制仍然僵化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提出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

^② 江泽民.《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体制，同时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江泽民强调要加强农村各类合作组织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从而提升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农村长治久安。最后，江泽民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江泽民认识到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并结合以往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通过规划建设小城镇来促进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提高农村地区的增长动能。他还特别强调小城镇建设要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要努力打破城乡发展边界，缩小城乡差距。

d.城乡统筹思想

尽管我国城乡关系总体向好，但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农村生产效率低，城乡差距仍令人堪忧。胡锦涛总结前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立足我国城乡发展实际，提出了城乡统筹思想。

首先，胡锦涛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的工作重点。2004年，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有利于准确把握城乡之间协调共进、相互支撑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胡锦涛还指出要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改变农村整体面貌。同时他还提出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给予农民农业补贴、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对重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等，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其次，胡锦涛强调要坚持统筹城乡，科学发展。2003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居于首位。200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指出中国总体上已处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高度重视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主张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努力消除工农、城乡差距，使城乡发展能够互相促进。另外，要统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打破城乡二元化体制，实现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进一步明确了要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e.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审视中国城乡发展现状,为破除城乡发展困境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性地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这是对我国城乡关系的又一重大调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构想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承继了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主张,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依据当代中国战略目标和最大客观实际,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明确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为新型城乡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坚持创新可以让城乡关系更和谐。由于城乡关系问题呈现出动态化和复杂多元的特点,构建中国新型城乡关系,既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也没有历史现成做法可沿袭,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保持协调可以让城乡发展更均衡。城乡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将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统一起来,注重二者的统筹协调,不偏颇任何一方,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树立绿色理念可以让城乡关系更可持续。绿色发展目的是着力解决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这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目标,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城乡生态融合互补,使得城市和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厚植开放可以让城乡关系更有序。新型城乡关系要求打破城乡资源要素交换的半封闭体系,使二者之间更开放,实现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有序交换,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推进共享可以让城乡关系更平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目的是让城乡居民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提升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所以,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破除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在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之间相互开放,推动资源要素在二者之间均衡配置,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最终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党的一切工作始终和我国经济发展各领域,同样塑造新型城乡关系也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是农民的权益长期得不到重视和保障，农业农村的发展要依靠农民，所以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他们的根本利益。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利民惠民，使得农民群众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建设者、共享者。同样，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加关注人民需求，不仅满足农村转移人口的住房需求，而且使其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注重从收入上缩小城乡差距，为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而且关注城乡居民发展的平等性和协调性，给予相同的发展机会、发展空间、发展资源，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让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如何要看人民是否满意，正如习近平总结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所以，城乡融合发展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城乡融合坚持城市和乡村的平等发展。习近平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①。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状态的根源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与乡村视为对立的两个主体，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对立性，这导致农民相对贫困、农业处于弱势、农村比较落后的状况依然严峻。而城乡融合发展重视城乡之间的同一性，改变以往城市带动乡村的模式，逐步提高乡村的主体地位，使其与城市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互相促进、相互受益，最终实现城乡共同进步。还要注意的，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使城乡一样化，而是将城乡发展统筹考虑，使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尊重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发展规律，让二者保持各自特点、强调各自不同的价值和功能，实现优势互补、互助前进，最终形成互利互惠、互利共荣的城乡融合体。

习近平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构想与他自身的工作经验、理论研究和生活阅历密切相关。他早期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思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兼具城市郊区与农村经济的特点，帮助正定走上了一条利城富乡的发展道路。之后在浙江任职的五年间，习近平以城市社区建设为指导，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辐射，积极建设新农村，率先统筹推进城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81.

乡一体化发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素材。在上海任职的一年里,习近平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作用。这些经验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也体现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及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城乡关系的理论创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城乡关系奠定理论基础,也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提供重要依据。

3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和问题

3.1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山西找准自身发展模式，以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改革创新，保障城乡居民安居乐业，促进全省高质量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山西省城乡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

3.1.1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山西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围绕“一核一圈三群”总体布局，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省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20年末，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2.53%，比上年末增长1.24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90%，比上年末增长1.03个百分点，转移农村劳动力37.7万人。根据图3.1可以看到，2011年-2020年山西省城镇常住人口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由2011年1773.88万人增长到2020年2182.78万人，农村常住人口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2011年1788.49万人下降到2020年1307.7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增长，十年增幅达12.74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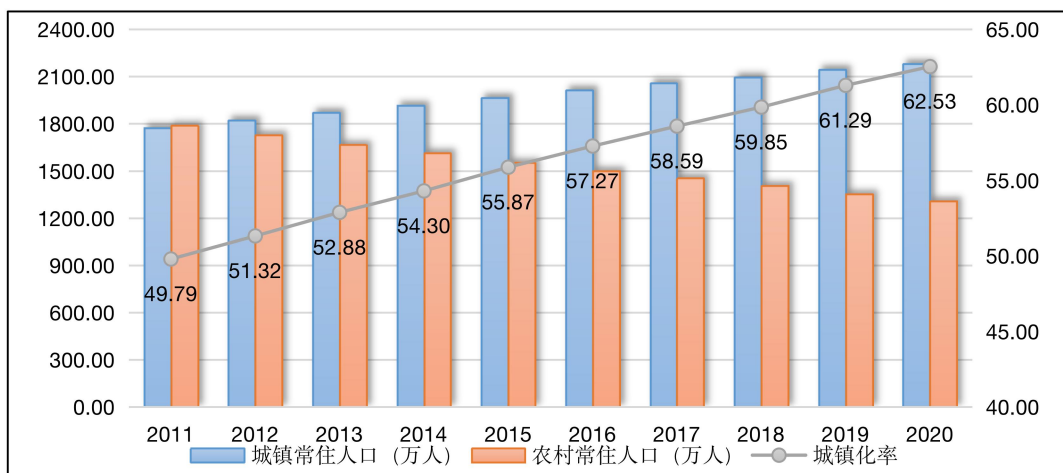


图 3.1 2011年-2020年山西省城乡人口数量及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3.1.2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山西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各项收入分配政策，着力构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让城乡老百姓的腰包都鼓起来。由图 3.2 可知，2011 年-2020 年山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显著上升趋势，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793 元，比 2011 年的 17965 元增长九成多，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78 元，比 2011 年的 6225 元翻了 1 倍还多。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从 2011 年 2.89 减小到 2020 年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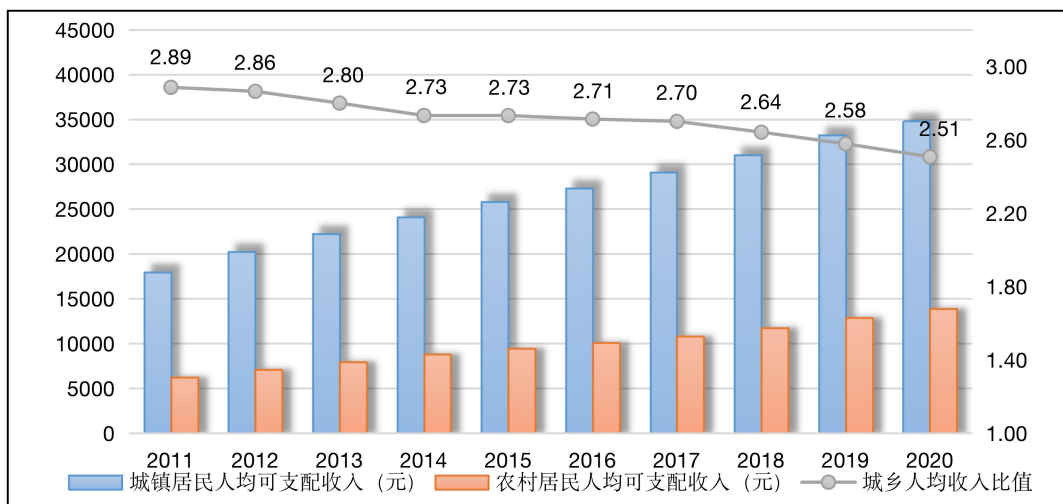


图 3.2 2011 年-2020 年山西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恩格尔系数表示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多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近年来，山西积极推动城乡居民消费方式、消费热点快速转换，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图 3.3 显示，2011 年-2019 年山西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20 年恩格尔系数出现反常上升，是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短期内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居民消费场景受限。但山西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从 2014 年到 2019 年连续六年都能维持在 30% 以下，说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实现优

化升级，生活水平处于相对殷实富足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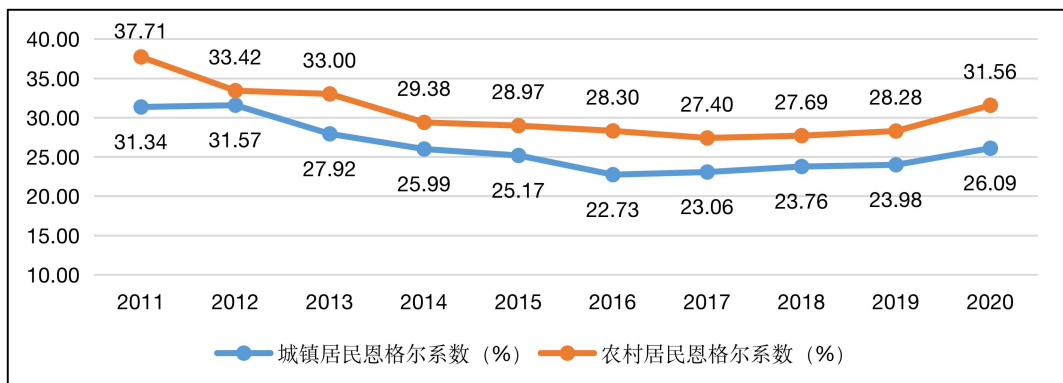


图 3.3 2011 年-2020 年山西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3.1.3 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合理配置，而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促进城乡互动与共同发展，增强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山西不断探索并逐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加强城市、小城镇和乡村的互联互通，城乡基础设施程度不断提高。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通过兴建大水厂和延伸集中供水管网等措施，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难题，2020 年底，全省城市用水普及率达到 99.6%，农村集中供水率 96%、自来水普及率 9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共建成农村供水工程 3.33 万处，服务全省 2418 万农村人口^①。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2020 年全省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 636.6 亿元，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达到 18.41 平方米，比 2011 年 7.87 平方米增长 1.34 倍，“四好农村路”新改建 1.82 万公里^②，全面超额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目标任务。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强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共建共享，2020 年城市

^① 数据来源：山西省水利厅

^② 数据来源：山西日报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 1.68 万吨/日，全省有 6 个设区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全焚烧、零填埋”。2020 年全省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 343.1 万立方米^①，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城镇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现象。

3.1.4 乡村建设持续推进

山西以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为主要任务，加强农村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村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2013 年至 2018 年，全省累计投入各级财政资金 12.9 亿元、其他各类财政支农资金 28.97 亿元及社会资本近 100 亿元用于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总共覆盖 600 多个行政村，150 万农民群众受惠。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山西积极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2018 年新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355 个，搬迁入住 31.3 万贫困户，入住率达到 86%，并且同步规划产业就业创业项目和搬迁后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保障搬迁群众的生计，更快开启新生活。近十年，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公路通车里程增加 7900 公里，升级改造农村公路 4.28 万公里，全省 1196 个乡镇、26420 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全覆盖^②。全省 99.7% 的村通电、8.4% 的村通天然气、84.5% 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12.7% 的村设立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3.3%^③。山西加快产业融合，培育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和农民增收。2021 年，全省休闲农业从业人员 42.4 万人、接待游客 6733 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 81.3 亿元^④。

3.2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问题

3.2.1 城镇体系的集聚辐射带动力不足

尽管山西省城镇化建设取得较快发展，但是仍然存在城市规模较小、省会城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② 资料来源：山西美丽乡村网

^③ 数据来源：山西省发展改革委

^④ 数据来源：山西日报

市竞争力不强且品质不高、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首先，山西城市规模较小且发展较慢。受地形地貌约束、矿城数量众多、人口总规模较少等因素影响，山西大城市数量较少，在全国排名中等偏下。2020年，11个地级市中只有太原、大同和长治的人口规模达百万以上，其中太原为I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405万，而同处于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区常住人口为995万，是太原的二倍多；大同和长治为II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分别为175万、102万，省内其他中心城市的规模更小，难以形成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山西城市经济实力偏弱。从GDP规模来看，11个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较低且发展不均衡。图3.4显示，2020年太原市GDP总量4153.25亿元，位居全省首位，是第二名长治市的2.43倍，阳泉市GDP规模最小，只有742.24亿元，不足太原的1/5。全省仅太原市进入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100，排第56位，在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中排名最低。从GDP增速来看，11个地级市增速区间为1.5%（晋中市）至6.1%（晋城市）之间，平均增速较上年下滑了2.19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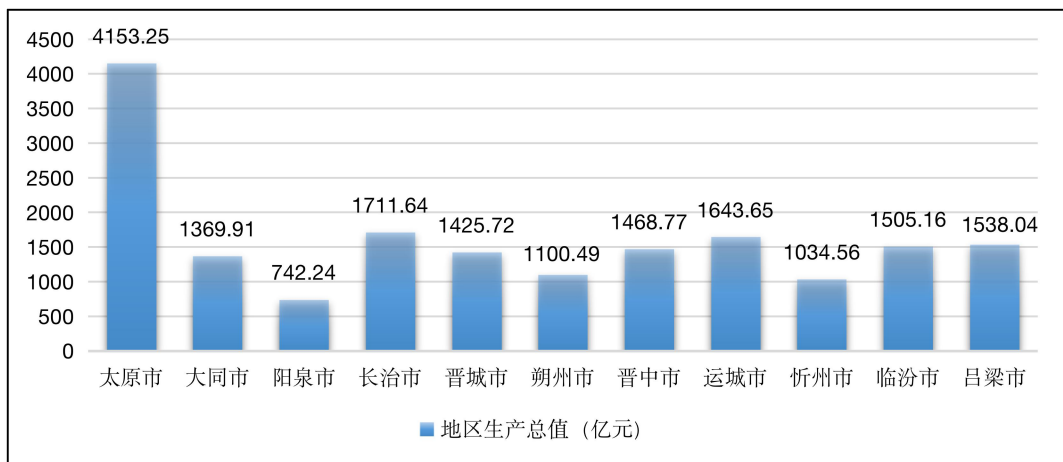


图 3.4 2020 年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其次，省会城市人口与经济集聚能力弱，带动作用不强。作为山西省会城市，太原市肩负着“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中部崛起增长极、引领全省全面转型核心引擎”等重大使命。然而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太原

“小省会弱省会”问题较为突出，与国家和山西所赋予的使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020年，太原市辖区面积6909平方公里，在省会城市中排倒数第三位，城市规模等级仅为I型大城市。从人口规模来看，2020年，太原市常住人口530.4万人，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24位，位列中部六省省会城市末位，不足武汉的1/2。从经济实力来看，2020年，太原市地区生产总值4153.3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20位，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排最末位，不足武汉的1/3。

最后，从全省范围来看，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山西11个地级市中除太原、大同和长治外，其他8个市区人口规模均低于100万人，其中吕梁市规模最小，仅45.7万人，远低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2020年，一半以上地级市的城镇化率未达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发展最快的太原市城镇化率为89.06%，比发展最慢的运城市（49.27%）高出将近40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报告》，在2020年，只有太原在全国291个城市中综合竞争力排名前50内，其他10市均排在中下游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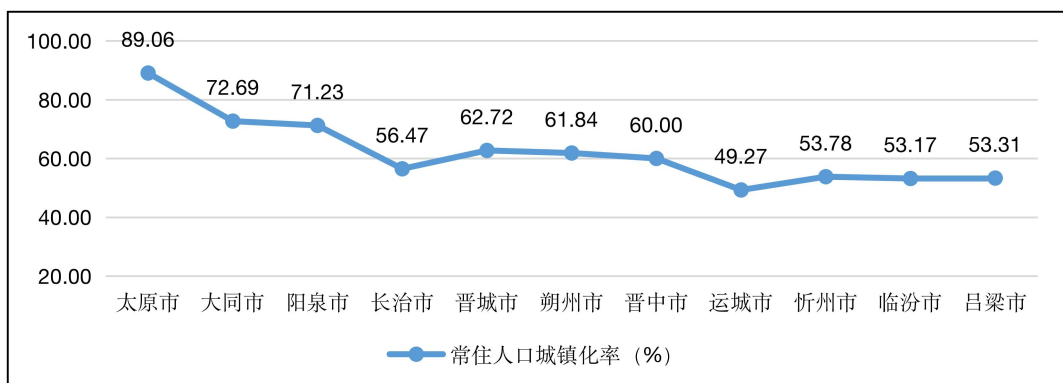


图 3.5 2020 年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3.2.2 农村劳动力、人才短缺问题凸显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村，流向城市发展和定居，而乡村劳动力年龄普遍偏大，人口老龄化严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口表现为净流出特点。同样，山西乡村发展也面临劳动力和人才短缺问题，

并且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导致产业生产力不足、经济发展缓慢等，加大了城乡差距，阻碍城乡融合发展。

根据图 3.6 可以看到，2011 年-2020 年山西省城镇常住人口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乡村常住人口数逐年减少。2020 年末全省城镇常住人口为 2182.78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 1307.72 万人，分别占全省常住人口 3490.5 万人的 62.53%和 37.47%，与 2011 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408.9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480.77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速度明显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山西资源型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煤化工产业集中的城市，导致省内出现许多“无人村”和“空心村”，并且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规定和政策指导，这一现象将会日益严重。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不仅导致耕地利用率下降、农业结构调整缓慢、科技兴农较难落实、农业面源污染加剧，而且造成乡村传统文化衰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落后、各项事业发展几乎停滞，不利于山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并且，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还会导致城市人口过于集中，造成城市房价、租金上涨，公共资源面临严重压力，社会矛盾加剧，不利于山西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不解决劳动力和人才短缺问题，乡村就无法实现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当前山西还没有健全完善针对农村吸引人才的政策保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就业创业环境差、收入待遇低、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制约了各类人才向农村聚集，导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如何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恢复乡村人气，形成与城市的良好互动，这是山西亟需突破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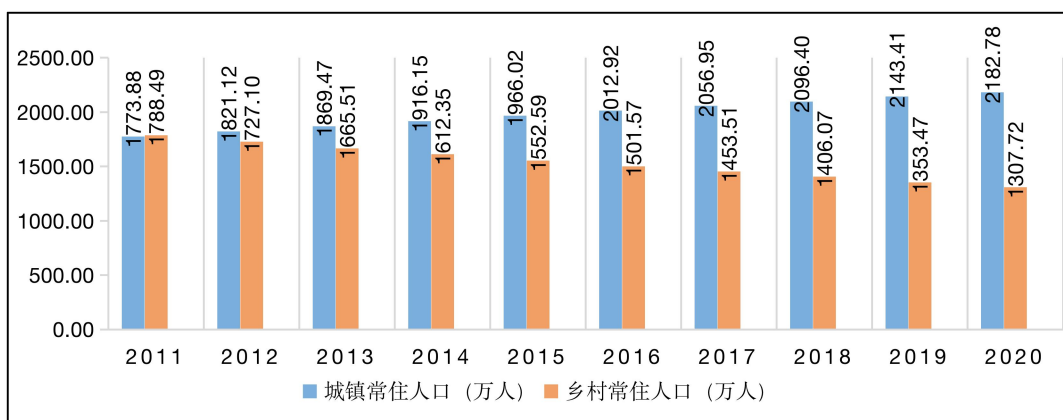


图 3.6 2011 年-2020 年山西省城镇及乡村常住人口数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3.2.3 城乡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山西的企业大多是资源依赖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增强山西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容小觑的破坏。尽管山西的生态环境随着经济转型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阻碍城乡融合发展。

一方面,城市环境问题仍有待解决。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生态环境状态公报》,山西有5个城市(太原、临汾、运城、阳泉、晋城)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倒数20位,约占全省地级市总量的一半,其中省会太原排全国倒数第3。从空气质量变化情况来看,山西有2个城市(太原和长治)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改善幅度排名中位列后20位。从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来看,临汾、吕梁位列全国后20位。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报告》,在2020年,只有太原和晋中在全国291个城市中生活环境指数排名前百位,其他9市均排在中下游的位置。城市大气、水环境问题是制约山西提升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乡村生产生活污染较为严重。由图3.7可以看到,2011年-2020年山西农用化肥施用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近三年下降幅度逐渐减小,2020年全省农用化肥施用量107.41万吨,较上年的108.41万吨减少了0.92%,而2019年和2018年农用化肥施用量分别减少1.10%和2.13%。从农药使用量看,2020年山西农药使用量为2.34万吨,较上年2.53万吨有所减少,但减少的幅度较小,并且还普遍存在农药叠加使用、超量使用的现象。由此可知山西农业生产化学化趋势仍未改变,农业面源污染仍然比较严重。有学者深入研究山西11个行政区农业面源污染强度并进行了类型划分^①:临汾、吕梁、晋中、运城为重度污染型;长治、忻州、大同、晋城、忻州为中度污染型;只有太原和阳泉为轻度污染型。山西乡村生活污染问题同样不容忽视。2020年,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约6.58亿吨、生活垃圾产生量约140万吨,分别占全省总量的53%和25%。而由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不健全、处理方式不合理,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较弱,从而使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举步维艰。“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实现城乡融合,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必须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① 贾陈忠,乔扬源.基于等标污染负荷法的山西省农业面源污染特征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03):141-149.

质量，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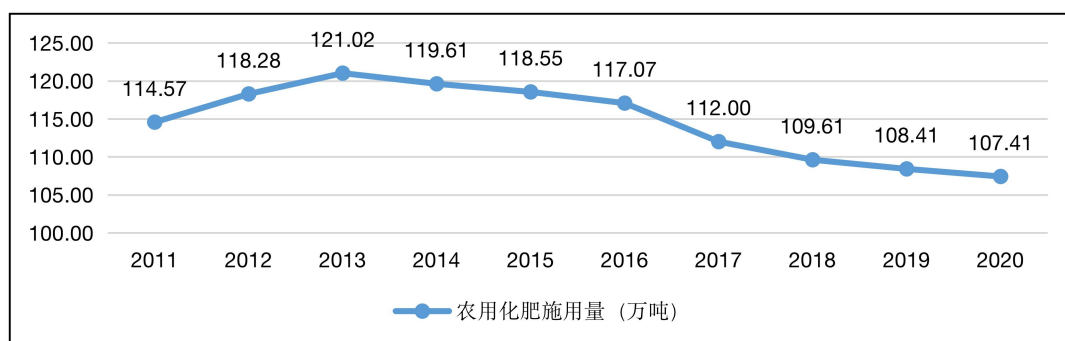


图 3.7 2011 年-2020 年山西省农用化肥施用量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局

4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为进一步研究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情况,本文决定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量化手段来具体分析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和短板。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本文在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科学性和客观性原则。在选择评价指标的过程中必须符合科学性要求,不仅要遵循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还要立足于评价对象的实际,才能使评价结果准确合理。本文所选取的测度指标需符合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要求,也要反映山西城乡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以确保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同时,选择指标应当尽量采取可以直接获取或者经过二次加工的指标,克服主观因素对水平评估的影响,真实反映所代替变量的信息,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2) 全面性和代表性原则。城乡融合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系统,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不仅体现社会进步的综合发展水平,而且包含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考虑。对城乡融合的测度需要形成涵盖范围相对较大的指标框架,并且评价指标越多,越能更全面的反映山西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由于各部分指标可能会相互交叉或能够互相替代,需要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除去重复指标,只选取关键的、具有代表性的。

(3) 数据可得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城乡融合可能涉及到一些难以量化的主观因素,为了方便研究,在建立指标体系时要综合考虑搜集和计算指标数据的难易程度,在保证数据来源可靠的前提下,选择所需数据容易获取和计算的指标,尽量避免难以量化的指标。

4.1.2 评价指标选取及说明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当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同时结合城乡融合的内涵特征，本文从城乡经济、要素、社会、生态融合这四个方面入手建立指标体系，并根据山西实际情况选取具体指标，包括反映地区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和体现城乡差距的对比性指标。

(1) 城乡经济融合

城乡经济融合反映城乡整体的经济状况及二者之间的联动性，是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其主要从城乡发展，城乡差距和产业布局三方面体现。城乡发展状况用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来衡量，人均 GDP 可以反映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人均 GDP 越大表示地区经济实力越强、城乡居民生活越富裕；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表示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越高代表地区产业结构越优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差距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来衡量，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体现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差距，也可以反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产业布局是否合理用二元对比系数来衡量，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结构二元性的强度，其值越小表明两部门的差距越大，城乡二元结构越突出，反之则两部门的差距小，城乡二元结构不明显。城乡经济融合指标对应着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目标。

(2) 城乡要素融合

城乡要素融合反映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其主要分为人口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三方面。人口流动程度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非农与农业从业人数比来衡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可以反映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程度，其值越大表示城市发展相对越成熟；非农与农业从业人数比能够体现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转移情况，其值越大表示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意味着非农部门在就业岗位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提升，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增强。资本流动程度用财政支农比重衡量，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可以反映资本流向乡村的情况，其值越大，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越强。技术流动程度用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是反映地区农业机械总体发展水平及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也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农业机械化

水平的提高会极大的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3) 城乡社会融合

城乡社会融合反映城乡居民整体生活状况，主要分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两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用交通网密度、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宽带接入用户数来衡量，交通网密度指通车公路里程与地区行政面积的比值，反映地区交通线路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要素的联系水平；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反映地区医疗设施的健全程度，其值越大表示城乡医疗卫生的硬件条件越好，对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能力更强；宽带接入用户数反映地区信息化水平，解决城乡信息藩篱是实现城乡之间资源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的关键。公共服务水平用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来衡量，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反映城乡居民精神生活的差异程度，对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乡风文明”目标；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体现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降低，说明地区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4) 城乡生态融合

城乡生态融合是城乡居民享有高质量生活和推进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生态宜居”目标，其主要从污染状况、资源消耗和环境治理三方面体现。污染状况用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农用化肥施用量来衡量，山西每年使用大量的煤炭，导致过多二氧化硫排放，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用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衡量污染程度具有较强代表性，农用化肥施用量可以反映农业面源污染状况，其值越小表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越好。资源消耗用单位 GDP 能耗来衡量，其能反映山西在经济转型中的节能降耗状况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治理用环保支出比来衡量，环保支出是解决各类环境问题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其值越大表示地区环境治理能力强。

4.1.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成型

依据前文论述，从城乡经济、要素、社会、生态四个层面，建立了有 4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18 个三级指标的山西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Z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A1 经济融合	B1 城乡发展	C1 人均 GDP (元)	+		
			C2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		
		B2 城乡差距	C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C4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	+		
			B3 产业布局	C5 二元对比系数	+	
			C6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		
	A2 要素融合	B4 人口流动	C7 非农与农业从业人数比	+		
			C8 财政支农比重 (%)	+		
		B5 资本流动	C9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		
			C10 交通网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		
			B7 基础 设施建设	C11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	
				C12 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	
	A3 社会融合	B8 公共 服务水平	C13 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	-		
			C14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	-		
		B9 污染状况	C15 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亿元)	-		
			C16 农用化肥施用量 (万吨)	-		
			A4 生态融合	B10 资源消耗	C17 单位 GDP 能耗 (万吨标煤/亿元)	-
				B11 环境治理	C18 环保支出比 (%)	+

注：指标中涉及的城乡比均采用城市指标数值/农村指标数值

4.2 评价方法及权重确定

4.2.1 数据来源

本章主要测度 2011 年至 2020 年山西省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 11 个地级市 2020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山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其中部分数据根据相应公式计算得出。原始数据如表 4.2 和表 4.3 所示。

表 4.2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原始数据

指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1 人均 GDP (元)	30534	32864	33848	34248	33593	33972	41242	45517	48469	50528
C2 第三产业 产值占比 (%)	32.6	35.8	38.4	41.2	49.8	51.1	49.2	51.1	51.1	51.2
C3 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89	2.86	2.80	2.73	2.73	2.71	2.70	2.64	2.58	2.51
C4 城乡居民 恩格尔系数比	0.83	0.94	0.85	0.88	0.87	0.80	0.84	0.86	0.85	0.83
C5 二元对比系数	0.10	0.12	0.13	0.14	0.15	0.16	0.14	0.13	0.14	0.18
C6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	49.79	51.32	52.88	54.3	55.87	57.27	58.59	59.85	61.29	62.53
C7 非农与农业 从业人数比	1.79	2.01	2.14	2.10	2.32	2.51	2.62	2.74	2.82	3.10
C8 财政支农 比重 (%)	10.21	11.22	11.21	10.63	11.52	12.60	12.72	13.57	13.29	12.79
C9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2927.30	3056.09	3183.30	3286.20	3351.65	1744.26	1376.30	1441.09	1517.57	1595.26
C10 交通网密度 (公 里/平方公里)	0.86	0.88	0.89	0.90	0.90	0.91	0.91	0.91	0.92	0.92
C11 每万人拥有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万人)	44.48	46.59	48.83	50.29	52.07	54.00	56.27	59.47	62.38	64.07
C12 宽带接入 用户数 (万户)	416.1	504.8	521.3	571.1	723.9	747.2	872.9	991.0	1126.1	1252.1
C13 城乡人均教育 文化娱乐消费 支出比	1.28	1.38	1.79	1.04	1.02	1.02	1.04	1.06	1.12	1.12
C14 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比	0.67	0.59	0.57	0.52	0.49	0.45	0.41	0.36	0.29	0.26
C15 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亿元)	118.81	102.25	95.17	89.13	76.10	37.91	20.44	15.00	11.62	6.94
C16 农用化肥施用 量 (万吨)	114.57	118.28	121.02	119.61	118.55	117.07	112.00	109.61	108.41	107.41
C17 单位 GDP 能耗 (万吨标煤/亿元)	1.76	1.69	1.58	1.52	1.52	1.45	1.40	1.35	1.31	1.28
C18 环保支出比 (%)	3.48	3.20	3.24	3.09	2.91	3.37	3.43	3.98	4.80	5.09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山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表 4.3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原始数据

指标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晋城	朔州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C1 人均 GDP(元)	78734	43982	56245	53778	64955	68889	43485	34383	38290	37762	45153
C2 第三产业 产值占比 (%)	63.0	57.9	53.5	43.9	42.5	54.2	47.0	49.6	48.5	49.6	35.6
C3 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	1.95	2.92	2.12	2.21	2.26	2.31	2.32	2.53	3.22	2.50	2.85
C4 城乡居民 恩格尔系数比	0.87	0.94	0.94	0.72	0.94	0.76	0.92	0.95	0.67	0.91	0.73
C5 二元对比系数	0.07	0.19	0.07	0.10	0.14	0.19	0.22	0.40	0.20	0.20	0.16
C6 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	89.06	72.69	71.23	56.47	62.72	61.84	60.00	49.27	53.78	53.17	53.31
C7 非农与农业 从业人数比	9.17	3.52	4.78	2.64	3.30	3.05	2.70	2.06	2.26	2.50	3.11
C8 财政支农 比重 (%)	5.04	14.60	6.68	11.81	10.99	16.04	13.86	9.05	18.13	14.03	17.54
C9 农业机械总动 力 (万千瓦)	51.17	115.33	36.41	129.47	63.50	148.58	185.96	316.62	184.86	225.16	138.21
C10 交通网密度 (公里/平方 公里)	1.04	0.90	1.28	0.88	1.02	0.96	0.98	1.14	0.69	0.94	0.83
C11 每万人拥有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万人)	81.16	74.44	59.52	61.67	65.75	62.94	52.24	69.68	52.94	61.69	46.81
C12 宽带接入 用户数 (万户)	241.8	91.9	53.6	107.1	69.9	44.3	119.1	158.5	82.1	122.9	100.3
C13 城乡人均教 育文化娱乐消费 支出比	1.18	1.04	0.81	1.23	1.04	1.40	1.28	1.31	1.48	1.28	1.47
C14 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人数比	0.56	0.29	0.73	0.23	0.21	0.40	0.12	0.17	0.40	0.40	0.40
C15 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亿元)	2.04	9.28	4.75	6.52	3.28	6.12	4.95	10.15	16.90	9.38	12.76
C16 农用化肥施 用量 (万吨)	2.24	7.86	1.45	10.87	6.07	7.05	9.57	26.33	14.04	15.60	6.34
C17 单位 GDP 能 耗 (万吨标煤/ 亿元)	0.78	1.22	1.16	1.49	1.31	1.58	1.37	1.94	1.09	2.09	1.69
C18 环保支出比 (%)	3.65	3.22	8.50	6.35	8.05	3.63	8.46	3.91	6.42	4.98	6.36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4.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以层次分析法为代表的主观赋权法和以因子分析法、熵权法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法,前者的缺陷是主观性较强,测度结果受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因此,本文选择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以使测度结果更具信服力。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建立原始数据矩阵。由评价指标建立一个 $n \times m$ 的数据矩阵,其中 n 为评价主体数, m 为指标数, x_{ij} 表示第 i 个样本第 j 项评价指标的值:

$$X = \begin{pmatrix} x_{11} & \cdots & x_{1m}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n1} & \cdots & x_{nm} \end{pmatrix}$$

第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text{对于正向指标, } y_{ij} =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text{对于负向指标, } y_{ij}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第三,计算第 j 项指标在第 i 个方案中占该指标的比重 p_{ij} 。

$$p_{ij} = \frac{y_{ij}}{\sum_{i=1}^m y_{ij}}$$

第四,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 e_j 和信息冗余度 d_j 。

$$e_j = -k \sum_{i=1}^m p_{ij} \ln p_{ij} \quad (\text{其中, } k = \frac{1}{\ln n}, 0 \leq e_j \leq 1)$$

$$d_j = 1 - e_j$$

第五,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4.2.3 指标体系的赋权

依据上述方法,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各级指标赋权,得到山西省及其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指标	权重 (山西省)	权重 (11 个地级市)
C1	0.0825	0.0737
C2	0.0447	0.0359
C3	0.0558	0.0354
C4	0.0534	0.0443
C5	0.0390	0.0743
C6	0.0505	0.0760
C7	0.0500	0.1248
C8	0.0515	0.0422
C9	0.0932	0.0628
C10	0.0327	0.0377
C11	0.0561	0.0463
C12	0.0668	0.0699
C13	0.0257	0.0719
C14	0.0462	0.0316
C15	0.0572	0.0319
C16	0.0663	0.0264
C17	0.0425	0.0425
C18	0.0860	0.0725

4.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本文采用线性加权方法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将熵权法得到的指标权重和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结合, 得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数值, 具体公式如下:

$$v_i = \sum_{j=1}^m (w_j \times y_{ij}) , i = 1, 2, \dots, n$$

4.3.1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2011年-2020年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总体水平以及经济融合、要素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方面的得分如表4.5所示。

表 4.5 2011年-2020年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分表

年份	经济融合水平	要素融合水平	社会融合水平	生态融合水平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2011	0.0105	0.0731	0.0170	0.0539	0.1545
2012	0.0818	0.1091	0.0459	0.0395	0.2763
2013	0.0724	0.1258	0.0484	0.0409	0.2874
2014	0.1073	0.1259	0.0907	0.0506	0.3744
2015	0.1276	0.1576	0.1136	0.0551	0.4539
2016	0.1159	0.1109	0.1295	0.1060	0.4624
2017	0.1445	0.1050	0.1519	0.1468	0.5482
2018	0.1798	0.1308	0.1779	0.1866	0.6750
2019	0.2029	0.1386	0.2057	0.2298	0.7771
2020	0.2309	0.1504	0.2239	0.2519	0.8571

4.3.2 各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2020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以及经济融合、要素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方面的得分如表4.6所示。

表 4.6 2020年11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分表

地级市	经济融合水平	要素融合水平	社会融合水平	生态融合水平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排名
太原市	0.1778	0.2041	0.1788	0.1058	0.6665	1
大同市	0.1231	0.1188	0.1369	0.0640	0.4429	5
阳泉市	0.1334	0.0949	0.1300	0.1552	0.5135	2
长治市	0.0869	0.0665	0.1064	0.1011	0.3609	8
晋城市	0.1442	0.0726	0.1297	0.1423	0.4889	3
朔州市	0.1484	0.1019	0.0645	0.0656	0.3803	7
晋中市	0.1278	0.0936	0.1051	0.1388	0.4653	4
运城市	0.1562	0.0757	0.1467	0.0286	0.4072	6
忻州市	0.0528	0.0875	0.0387	0.0895	0.2685	11
临汾市	0.1110	0.0864	0.1017	0.0517	0.3508	9
吕梁市	0.0587	0.0892	0.0463	0.0861	0.2804	10

5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5.1 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

根据表 4.5 中山西省 2011 年到 2020 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分情况，绘制相应柱状图展示其变化趋势，如图 5.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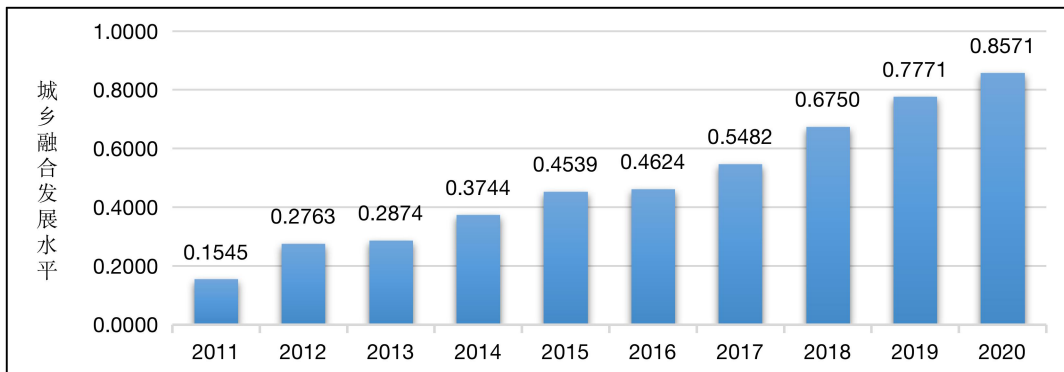


图 5.1 2011 年-2020 年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柱形趋势图

根据表 4.5 中山西省 2011 年到 2020 年城乡经济融合、要素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水平得分情况，绘制相应折线图展示其变化趋势，如图 5.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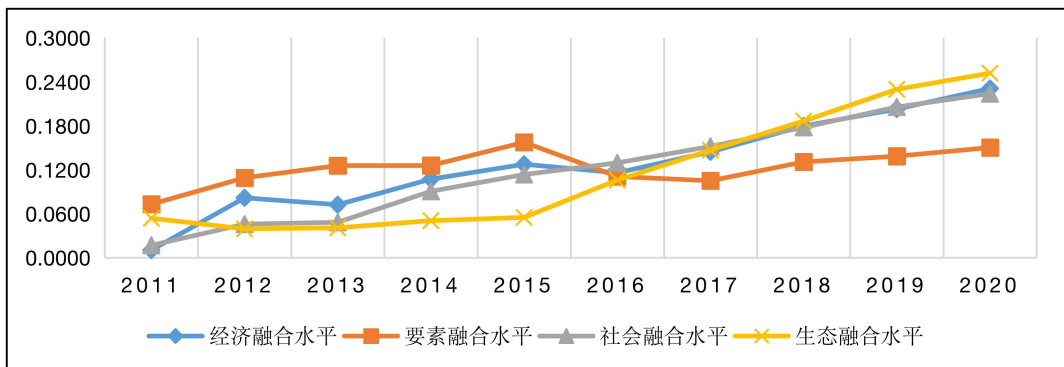


图 5.2 2011 年-2020 年山西省城乡融合一级指标得分的折线趋势图

由图 5.1 可知，2011 年到 2020 年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城乡关系得到改善。其中，2012 年增速明显加快，这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密切相关，之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增速放缓，进入相对平稳增长阶段，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之后,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持续上升。从图 5.2 可以看到,城乡经济融合水平、社会融合水平和生态融合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同时发展过程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城乡要素融合在 2011 年到 2015 年呈上升趋势,在 2016 年得分下降,主要是由于 2016 年后农用运输车不再统计,农业机械总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 2016 年到 2020 年基本上仍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具体来看,城乡经济融合水平 2011 年为 0.0105,2020 年达到 0.2309,增加了 0.2204;城乡社会融合水平 2011 年为 0.0170,2020 年达到 0.2239,增长了 0.2069;城乡生态融合水平 2020 年为 0.2519,比 2011 年的 0.0539 提高了 0.1980。从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贡献度来看,经济融合的贡献度最高,达到了 31.37%,说明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更具针对性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下面对测度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5.1.1 经济融合

经济融合是推进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整体经济水平提升,才能为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活富裕”目标提供支持。虽然山西城乡经济融合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升,但 2020 年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得分比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得分低,说明其对于城乡融合的推动性作用并没能完全体现,山西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不足。首先,整体经济实力较弱,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2011 年山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0534 元,与同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6277 元相差 5743 元,2020 年山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0528 元,与同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2000 元相比,差距拉大到 21472 元,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次,产业发展层次不高,产业转型升级困难是阻碍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目前山西已形成“三二一”的产业格局,但以煤炭产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对能源的依赖性仍然比较大,其升级改造离既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还未真正形成,并且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乡村产业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与“产业兴旺”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最后,城乡经济差距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具体体现在农村居民不管是收入还是消费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应该继续探索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升级的有效路径。

5.1.2 要素融合

要素融合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根据测度结果来看，虽然山西城乡要素融合水平得分从 2011 年至 2015 年和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都呈上升趋势，但是速度缓慢，最终分值也相对较低。说明城乡要素融合通道不畅通，容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率增速缓慢、农村劳动力迁移程度不高和农业农村科技赋能不足。山西城镇化率从 2011 年到 2020 年一直是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并且逐渐靠近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其积极推进“一核一圈三群”城镇体系构建的结果，但是总体增长还是比较缓慢，说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仍有障碍，需要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同时，从 2011 年到 2020 年山西非农产业从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 1.33%，增长速度慢于全国水平的 1.57%，可见还需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些年，山西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但是城市的科技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是明显优于农村，使得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民科技素质偏低，为提升城乡要素融合水平，必须促使农村科技要素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5.1.3 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反映地区城乡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从得分情况来看，山西城乡融合水平上升趋势较稳定，说明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目前社会融合体系仍不健全，还不能完全满足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从道路建设看，山西公路网密度显著提高，促进了城乡要素和资源的充分流动，但还存在高等级公路占比较低的问题，导致部分干线公路的通行能力差、效率低，难以满足大吨位运输、大交通量的通行要求，并且农村公路网的技术等级、通达深度、覆盖广度和畅通能力也有待提升。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看，山西城乡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还有较大差距，2020 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比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多三倍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要素的流动。在公共服务方面，2020 年山西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为 1.12，农村居民所享受的

公共服务与城市居民还有一定的差距，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短板，要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1.4 生态融合

从图 5.2 可以看到，2011 年到 2020 年山西城乡生态融合水平逐年上升，特别是 2016 年以后增速相对较快，主要得益于在此期间山西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加强环境污染防治，城乡生态融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具体来看，山西生态融合程度仍然不足。山西作为能源资源大省，过去一直依赖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些年，山西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单位 GDP 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持续下降，但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多，还需继续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另外，就城乡进行对比，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还是相对较差，山西农村还存在农业生产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不足、生活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短缺等问题，必须积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5.2 各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

根据表 4.6 中 2020 年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得分，绘制相应柱状图展示地区差异，如图 5.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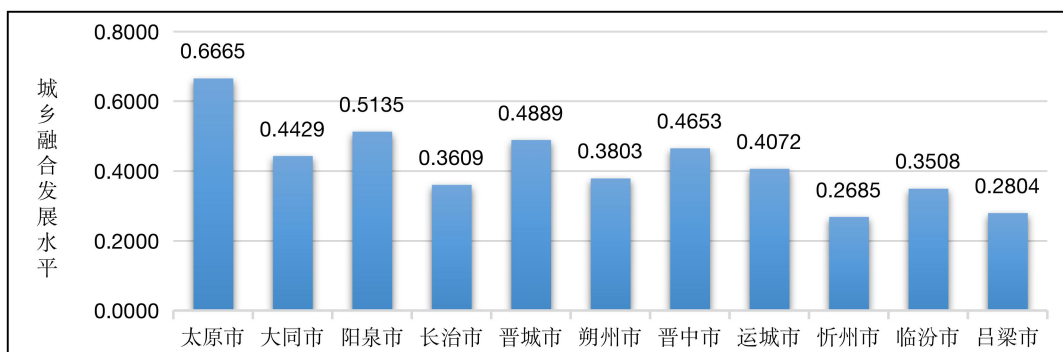


图 5.3 2020 年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柱形图

根据得分情况，将 11 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高水平

(≥ 0.5)，中高水平 (0.4~0.5)，中等水平 (0.3~0.4)，低水平 (< 0.3)。太原市、阳泉市处于高水平阶段，其中，太原市得分 0.6665，位列全省第一且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阳泉市，二者分差 0.15 以上；晋城市、晋中市、大同市和运城市处于中高水平阶段，其中，晋城市得分 0.4889，排名第三，即将步入高水平阶段，运城市得分 0.4072，刚刚达到中高水平的标准；朔州市、长治市和临汾市处于中等水平阶段，并且得分均在 0.35 以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中等偏高；吕梁市、忻州市处于低水平阶段，排名第十和第十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为了发现阻碍各市城乡融合推进的薄弱点，找到促进山西城乡融合的有效办法，下面分区域对各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分析。

5.2.1 晋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晋北地区的三大城市分别处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大同市在经济、要素与社会融合方面表现良好，而生态融合水平相对较低，主要由于大同市以煤炭生产为主导产业，煤炭的过度使用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与其他市相比环保投入力度不足，需要对产业结构作出深度调整并积极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朔州市在经济融合方面表现良好，在要素融合方面表现一般，而社会融合水平最低，主要体现为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健全，城乡接入宽带用户数少，还不到太原市的 1/5，需要重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之间要素联系。忻州市在生态和要素融合方面表现较好，而在经济和社会融合方面融合度不佳，主要是由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高，远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并且交通网密度全省最低，需要加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促进忻州经济快速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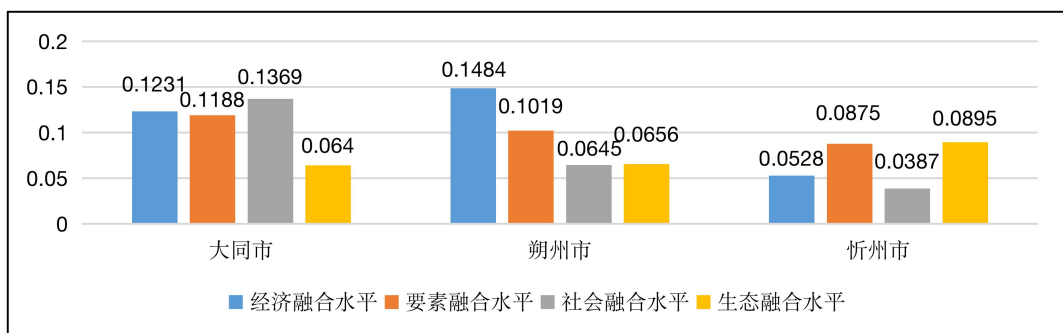


图 5.4 2020 年晋北地区城乡融合一级指标得分柱形图

5.2.2 晋中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晋中地区四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速度不同。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工业基础相对扎实，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全省经济实力在处于领先地位，这为太原市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开展城乡社会治理和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能够辐射带动周边乡村更好地发展，因此太原市城乡融合发展速度很快，经济融合、要素融合和社会融合方面融合度高，生态融合水平相对较低，还需加强城乡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阳泉市整体发展不错，主要得益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和交通网密度较高，城乡融合的困难和压力较小，实现了城乡融合水平趋近于良好。晋中市城乡融合发展潜力大，在经济融合和生态融合方面表现较好，在要素融合和社会融合方面还有欠缺，主要表现在城镇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和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较低，还需重点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提升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吕梁市城乡融合发展速度很慢，一方面第三产业产值较低，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且层次低，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受地形影响，吕梁交通发展困难，导致城乡生产要素及产品自由流动受阻，城乡发展不平衡，需要进一步完善道路建设，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着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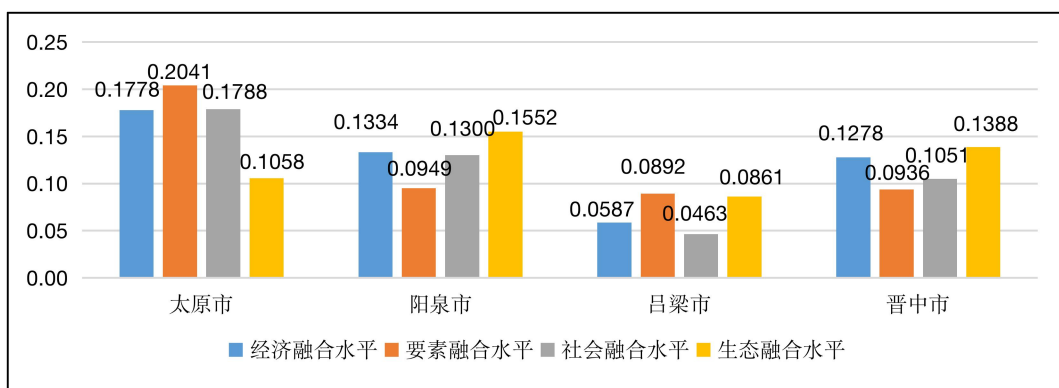


图 5.5 2020 年晋中地区城乡融合一级指标得分柱形图

5.2.3 晋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晋南地区两大城市临汾市和运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状况相似，二者都是经济融

合和社会融合水平较高，而在要素融合和生态融合方面表现不佳。主要由于临汾市和运城市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单位 GDP 能耗和农用化肥施用量较高。2020 年，运城市的城镇化率为 49.27%，临汾市的城镇化率为 53.17%，在全省分别排名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远低于太原市（89.06%）、大同市（72.69%）的城镇化率，因此人口流动程度也相对较低，城乡要素融合速度缓慢。2020 年，临汾市的单位 GDP 能耗为 2.09 万吨标煤/亿元，农用化肥施用量为 15.60 万吨，运城市的单位 GDP 能耗为 1.94 万吨标煤/亿元，农用化肥施用量为 26.33 万吨，在全省均排名前两位。能源消耗强度大和农业面源污染加剧使两座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因此，临汾市和运城市亟需提升城镇化率、加强环境治理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以促进城乡要素融合和生态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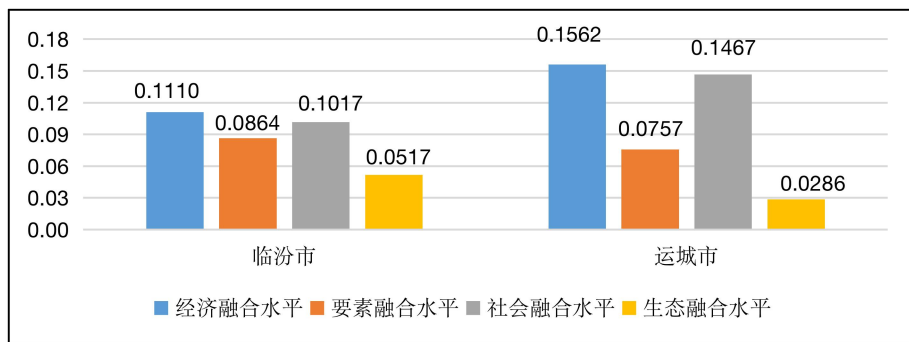


图 5.6 2020 年晋南地区城乡融合一级指标得分柱形图

5.2.4 晋东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晋东南地区中晋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良好，主要得益于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非农从业人员占比较高而农用化肥施用量较少，并且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较小，二者的恩格尔系数均能达到富裕水平，所以城乡融合发展的难度较低，稍微不足的是要素融合方面，农业机械总动力较低，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以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2020 年长治市地区生产总值全省排名第二，仅次于太原市，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较强，但城乡融合水平只处于中等水平阶段，经济融合水平不高，说明长治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具体表现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低，并且要素融合水平较差，主要由于就业结构不合理，为促进城乡平衡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和就业结构，调动更多资源投入农业发展和

乡村建设，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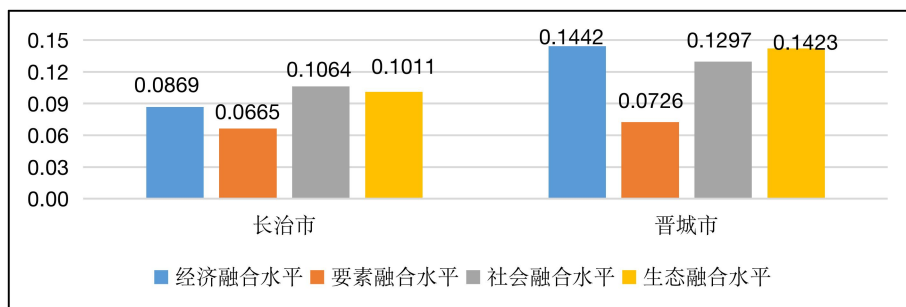


图 5.7 2020 年晋东南地区城乡融合一级指标得分柱形图

6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城乡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6.1 加快构建城乡现代化产业体系

山西全方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首要任务是实现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将城乡经济整体提升，才有能力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而统筹城乡发展。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山西应该以产业为抓手，推动城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成，实现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源型经济的路径依赖是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转型，尤其是大同等以煤炭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必须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现山西创新型经济发展的目标。在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方面，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煤炭、钢铁、建材、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发展模式向内涵集约转变。并且继续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提升能源产业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当好全国能源革命的“排头兵”。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以“一煤独大”变“八柱擎天”为目标，基于各地的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发展煤层气、节能环保、生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市场需求为第一主导力量，依托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型骨干企业及活力旺盛的中小企业，建成一批省内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打造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对于大同等主要依赖煤炭资源发展的城市，要坚持把非煤现代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积极培育新动能。在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方面，推动现代物流、数字信息、现代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高端化转变，文化旅游、体育休闲、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升级，形成山西服务品牌标志。

乡村经济发展的活力源于乡村产业的发展，只有乡村产业兴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才能有效缩小。一方面，坚持“特”“优”战略，做大做强有机旱作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西时指出“山西山多地少、地貌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发展小杂粮、鲜干果、蔬菜、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拳头产品，做强“山西小米”、“大同黄花”、“忻州杂粮”、“安泽连翘”等山西

特优农产品品牌，为“有机旱作·晋品”省域农业品牌做有力支撑。同时，通过北上京津冀、南下粤港澳、东进长三角，拓宽国内国际市场，打开产品销路。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就一二产业融合发展而言，以特色农产品产区为基础，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以农业产业园为基础，大力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入驻园区，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推动产业振兴。就一三产业融合发展而言，将丰富的农耕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优势相结合，推进休闲农业与文旅、康养、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衍生乡村旅游新业态和新产品，培育农村经济新增长点。就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而言，将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与乡村民宿、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相融合，同时融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建设，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6.2 畅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渠道

只有破除阻碍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才能使城乡拥有公平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测度结果显示山西的城乡要素融合水平并不高，并且大多数地级市也在要素融合方面表现不佳，所以山西要重点构建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机制。

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口流动问题是城乡融合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畅通城乡人口流动的双向渠道。第一，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虽然太原等市的城镇化率较高，但是城镇化建设品质不高且城市竞争力不强，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必须积聚自身发展动能，进一步提高产业质量和人口集聚能力，增强城市竞争力、辐射力、吸引力，从而提高城镇化质量。对于运城、临汾等城镇化率还比较低的城市，要通过适度放宽城镇落户条件，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确保人口“流得出”。同时，注重农村“空心化”问题，适当推出入乡返乡人员的农村落户政策，使想在农村干实事的人顺利落户，确保人口“回得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第二，强化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技能水平，激发其生产潜力和积极性，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优化就业结构。第三，健全和完善人才入乡激励机制，为返乡各类专业人才提供财政、金融和社会保障支持，比如加大债券安排、提供创业贷款、减免税费等，营造良好的创业条件和工作环境，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使返乡人员放心

投身农村建设，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资本是农村最缺乏的生产要素，农村的生产方式竞争力相对较弱，导致资本无法大量积累，使得农村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山西需要强化农村发展资金保障。第一，完善城乡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农银互通合作，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支农产品、拓展多元金融服务，保障农业农村发展资金充足。第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相应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为农村建设筹集更多的资金。第三，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为农户提供全面、高标准的农业保险，提升农业风险保障能力，确保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畅通城乡技术要素流动，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山西大部分农村资源稀缺，农业技术水平较低，首先应在资金和政策上为农业先进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保障，并积极推广城乡之间的技术交流活动，比如创建城乡科技人才之家，鼓励城市科技人员定期开展技术指导或宣讲活动等。引导各地立足自身农业发展优势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并加强与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山西农科院等省内外科研院所合作，在城乡广泛开展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同时加快建设杂粮种质创新与分子育种、有机旱作农业等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提高农业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加快山西农业现代化进程。

6.3 打造宜居宜业城乡环境

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的高品质生活环境是不断增强城乡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所在。山西城乡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水平还不太稳定，需要继续通过资源整合、联建联动，推进设施共通、服务共享、环境共美、城乡共进，提高城乡发展宜居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6.3.1 进一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在交通运输设施方面，加强与省内产业集群布局及“一群两区三圈”空间布局相匹配的重要通道建设，使内部循环更加畅通。同时，加强与国家战略对接的出省通道建设，与北京、河北、陕西等周边省市进一步密切联系，使外部衔接更加紧密。还要继续完善覆盖县、乡、村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做好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运营工作，促进城乡要素的充分互流。目前，吕梁、忻州的交通网密度还很低，需要进一步完善道路系统建设，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积极推进网络强省战略、“互联网+”行动等，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升信息化水平。朔州等市农村互联网设施不健全，要扩大农村宽带网络等硬件设备的覆盖范围，确保城乡信息畅通。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抓好农田水利、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稳住农村经济大盘；加大路水电气等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农村道路硬化亮化、饮水安全工程和电力设施升级改造，为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6.3.2 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医疗卫生方面，山西在推动县乡医卫机构一体化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还需结合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现状推出一系列配套措施，调动医疗技术人员参与积极性，从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在教育文化方面，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补齐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短板，按需有序增加城镇学位供给，提升城乡学校办学能力；利用好国家和省级“特岗计划”，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优质教师资源向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推动城乡教育深度融合。同时，积极推动舞台话剧、艺术展等文化活动和剧院、文化服务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广泛覆盖农村地区，满足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在社会保障方面，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

6.3.3 持续改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西应该以“生态宜居”为目标，继续加大财政资金对于城乡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支持力度，积极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探索建立先进产能激励机制，促进全省企业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临汾和运城单位 GDP 能耗在全省排名最高，需要重点对两市的高能耗企业进行监督和整改，鼓励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创新生产技术，

发展低碳经济。同时，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还要完善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继续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山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可以将美丽乡村建设与乡土文化、传统村落保护相结合，推动构建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Akihisa Nonaka,Hiroshi Ono.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ies though the restructuring the self-sufficient realm Growth in small-scale rapeseed production in Japan[J].Jap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Quarterly,2015,49(4):383-390.
- [2]Amritkant Mishra,Amba Agarwal.Do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urbanisation lead to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some Asian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Economy,2019,11(2):167-183.
- [3]Aurora C,Rossella G,Davide M,et al.The local agrifood systems in face of changes in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the foodscape of Rome[C].European IFSA Symposium Farming systems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Capacities and strategies, Berlin (Germany), 1-4 April, 2014.
- [4]Bjørkhaug H,Knickel K.Rethinking the links between farm modernisation,rural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e[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8(59):194-196.
- [5]Datt,Gaurav,Ravallion,et al.Is India's economic growth leaving the poor behind?[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3):89-108.
- [6]Delfmann H,Koster S.New firm formation and its effect on employment growth in declining regions[J].Accounting Horizons,2014,25(1):127-147.
- [7]Howard ES.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J].Organization&Environment,1946,16(1): 98-107.
- [8]Kawate Tokuya.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form of rur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rural Japan[J].Journal of rural Problems,2005,40(4):393-402.
- [9]Mc Gee,T.G.Urbanization or Kotadesasi The Emergence of New Region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in Asia[R].East West Environment and Polic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1986.
- [10]P.Veneri,V.Ruiz.Urban-to-Rural Population Growth Linkages[R].OEC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2013.
- [11]Richard E Wood.Survival of rural America:Small victories and bitter harvests[M].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8.
- [12]S.Lunkevicius,L.Ustinovicius,E.K.Zavadskas.Possibilities of revitalization of

- unused rural property[J].Statyba,2001,7(1):44-55.
- [13]Sophie Xuefei WANG,F.U.Yu Benjamin.Labor mobility barrier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8,53(2):221-224.
- [14]岸根卓郎.迈向 21 世纪的国土规划—城乡融合系统设计[M].高文琛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 [15]陈丹,张越.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逻辑、关键与路径[J].宏观经济管理,2019,(01):57-64.
- [16]陈潭.数字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与新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02):19-27.
-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
- [18]丁忠兵.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性[J].重庆社会科学,2018,(04):25-31.
- [19]范今朝.行政区划体制与城乡统筹发展——以浙江省当代改革实践为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 [20]关浩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思路与政策取向[J].农业经济,2018(10):3-5.
- [21]郝晓斌,章明卓.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研究综述[J].山西建筑,2014,40(35):21-22.
- [22]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地理研究,2018,37(11):2127-2140.
- [23]黄渊基,蔡保忠,郑毅.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06):22-27.
- [24]贾陈忠,乔扬源.基于等标污染负荷法的山西省农业面源污染特征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03):141-149.
- [25]贾小宇,陕永杰.黄土高原城乡融合区域差异——以山西省为例[J].天津农业科学,2020,26(06):60-64.
- [26]江泽民.《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7]姜长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J].区域经济评论,2018(03):114-116.
- [28]康永超.城乡一体化的苏南模式及其创新[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04):56-60.

- [29] 李爱民.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问题与路径[J]. 宏观经济管理, 2019(02):35-42.
- [30] 李长学. 论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内涵、逻辑成因与推行路径[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8, 39(05):13-18.
- [31] 李周.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含义、实施策略和预期变化[J]. 求索, 2018, (02):44-50.
- [32] 廖彩荣, 陈美球.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7, 16(06):795-802.
- [33] 列宁. 《列宁全集》(第 1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264.
- [34] 刘合光.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1-9.
- [35]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04):637-650.
- [36]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与前景[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 [3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104.
- [3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308-309.
- [3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422.
- [40] 马义琳, 潘明辉.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思考[J]. 当代农村财经, 2021(03):2-8.
- [41] 马义华, 曾洪萍. 推进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和战略重点[J]. 农村经济, 2018(06):11-16.
- [42] 欧万彬.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解读与实践要求[J]. 北方论丛, 2020(03):37-44.
- [43] 宋迎昌. 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思路——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1(01):131-136.
- [44] 唐琼. 乡村振兴战略下稳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J]. 湖湘论坛, 2020, 33(02):88-98.
- [45] 涂圣伟. 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导向与实现路径[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04):103-116.

- [46]托马斯·摩尔.乌托邦[M].戴镗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47]万信,龙迎伟.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价值及实现理路[J].江苏农业科学,2018,46(17):327-330.
- [48]王佳宁.乡村振兴视野的梁家河发展取向[J].改革,2017(11):16-18.
- [49]魏后凯.如何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03):14-18.
- [50]吴元波.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关系与路径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2013(6):86-92.
- [5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81.
- [52]邢澍,王国勇.贫困地区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J].农村经济,2019(08):51-59.
- [53]许彩玲,李建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J].经济学家,2019,(01):96-103.
- [54]许德才,唐少清.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趋势研究[J].生态经济,2013(9):92-95,100.
- [55]闫坤,鲍曙光.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及实施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19,(03):90-97.
- [56]杨飞虎,杨洋,林尧.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价格月刊,2020,(09):70-77.
- [57]杨志恒.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内涵与机制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35(04):111-116.
- [58]姚毓春,梁梦宇.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及政策选择[J].经济纵横,2021,(01):46-53.
- [59]叶超,庄良,吴佩瑾.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04):43-51.
- [60]殷锐.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以广东省为例[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29(04):51-55.
- [61]张建伟,图登克珠.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内涵与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0(07):22-24.
- [62]张明斗,赵满满.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与路径研究[J].东北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05):1-7.

[63]赵德起,陈娜.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9(12):1-28.

[64]赵华,丁凡.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J].南大商学评论,2019(04):26-42.

[65]赵早.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探析[J].学习论坛,2020,(08):34-40.

[66]周佳宁,秦富仓,刘佳,朱高立,邹伟.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9):166-176.

后记

时光飞逝，转眼间三年又过，在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之际，我也即将结束在兰州财经大学的学习生涯。回顾过去这三年，我所收获的不仅仅是愈加丰厚的知识，还有在此期间不断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同学，让我在一个充满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三年时光，这份情谊是我人生中的巨大财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我的导师，让我能加入一个庞大又温馨的师门，和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共同学习进步。导师为人和蔼，平易近人，总会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答疑解惑，在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认真的研究，为我提出标新立异的修改意见。恩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朴实乐观的人格魅力一直深深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不断进取。感谢张小瑛师姐，师姐不仅在课题写作上对我们悉心帮助和指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关心和照顾。感谢经济学院的全体老师们，他们教授了许多良好的学习方法，不断启发和帮助我，使我受益匪浅，较好地掌握了每门功课的内容，为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感谢与我朝夕相处、关心和帮助我的同学们。感谢王宁同学和马明玉同学，三年间我们在学习上互相督促，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因为她们的陪伴与鼓励，让我能在学校度过充实而又快乐的时光。感谢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同学们，因为大家的帮助与支持，我的研究生生涯才能完满的结束。

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默默无私地奉献着爱与宽容，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让我不必面对生存的压力，全身心投入学业和追求梦想。在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下，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养育之恩唯有用明日的努力和奋斗来回报，愿父母永远平安健康。

学校生活即将远去，步入社会又是一个新挑战的开始。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但不论身处何境，我将会不断奋斗，缔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